“大学名师讲义”系列

中国传统智慧与艺魂

王树人　著

武 汉 出 版 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老 树 自 序

《传统智慧再发现》一书，分上下两卷，1997 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此书是我与夫人喻柏林合作，差不多经过近十年才完成的专著。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这部书出版至今也已十年，虽然经过多次重印，却始终未进入打折书的行列。现在，应武汉出版社之邀，由我对该书上卷作一次修订，作为单行本发行，书名为《中国传统智慧与艺魂》。希望借此能深化原书提出的观点，并补充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在我写这篇序言时，喻柏林已经逝世五年。回想当年著述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令人不胜叹惋。在本书的四篇中，《汉字凝结的智慧》一篇，其内涵之丰富及其深刻的学术性，完全是与喻柏林长期从事汉字认知心理研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其他三篇：《〈周易〉的智慧与魅力》、《禅悟的智慧》和《中国传统艺术美及其灵魂》，也是与她共同讨论由我执笔写成的。所以，在此书面世之际，不能不首先提到她，以慰柏林在天之灵。

本书在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时，可以说完全打破了以往的教条框框，并且展开一个根本性的新视角。这个视角，就是“象思维”的视角。因此，可以说，运用“象思维”这个视角去透视和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本书的一个特征。即使是与“象思维”相应的诗意表达，已经不可逆转地被逻辑概念式的表达所代替，但在解读和领会中国原典时能有“象思维”的视角，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中国儒、道、佛的原典主要是“象思维”的产物，而非西方逻辑概念思维的产物。如果说西方理性主义，运用逻辑的概念思维，能使思想规范和系统化，那么中国诉诸悟性的具有诗意把握的“象思维”，则能在“象的流动与转化”的体悟中推动新智慧的发掘。有鉴于此，为了首先使读者能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在这里，特把作者对这个问题的专论《中国的“象思维”及其原创性问题》作为《代绪论》置于全书之前。

19 世纪中叶以降，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曾长时间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那一时期，中国的先进人物都把救亡和振兴中华的希望转向西方，力图在西方思想文化中寻找救亡和振兴中华的真理。相反，则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视为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这种思潮，几乎占据了中国整个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今天，当我们反思这段历史时，不能不惊异地发现，正是在中国先进人物在思想文化上转向西方的时候，西方思想文化已经陷入深重的危机。这时，西方先进思想家在为这种危机寻找出路，从叔本华、尼采一直到现象学运动中的海德格尔，以及现代法国后现代派的思想家们，则不同程度地都在从东方特别是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寻找批判的武器和加以借鉴的思想文化资源。中国传统儒家、道家、禅宗所代表的中国思想文化，一直为西方大思想家所青睐、研究和借鉴。近代以来，从莱布尼兹、伏尔泰到叔本华、尼采，一直到海德格尔，都是对之仰视和崇敬的，并且构成他们思想体系创造的重要启迪因素。不仅如此，在自然科学领域，一些大物理学家，例如日本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汤川秀树（1907—1981）、丹麦物理学家波尔（1885—1962）、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1901—1976）等，在他们的新发现中，也受到中国传统道家思想的影响，以为借鉴，或者产生共鸣而向之趋近。这样，在反思中国 20 世纪思想文化思潮时，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性质，必须加以重新评价。

本书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几个重要领域的重新审视和发掘，就是作者力图作出的一种重新评价。当然，通过这种评价所要表明的，显然并不是否定向西方学习和寻找真理，也不是否定从西方思想文化中寻找可以得到启发的视角和方法 就是说，不是简单地否定“拿来主义”。但是，当这种“拿来主义”把我们自己的传统思想文化完全遮蔽，甚至用落后的罪名加以简单否定时，像整个 20 世纪大部分时间所表现的那样，严重的问题就发生了。这个严重问题就是，由于教育制度的全盘西化，已经使中国不只一两代人与自己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断裂。如何解决这个严重而又复杂的问题？这主要是教育部门和文化部门（也包括社会各界）要深入考虑的问题。我这里想提示的是，西方从大思想家到大科学家都那么青睐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并从中受到启发而有所创造的事实，足以证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不仅不能简单地对之冠以落后的帽子，而且确实存在极其有价值的合理内涵。同时，这个事实也提醒我们，当我们在向西方思想文化学习和寻求启迪时，也必须提倡重新向自己的民族传统思想文化学习和寻求启迪。不久前，我

国著名数学家吴文俊先生，正是在研究了中国数学史的基础上，创造了震动世界数学界被称之为“吴方法”的“几何定理机器证明方法”，获得我国科学创造发明的大奖。吴先生在谈到这项成就时指出，他以前在国内两次获大奖，都是在其法国老师原创基础上所作的某种开拓。这次成就之不同，乃是在借鉴中国数学史而受到启发下所作的独立创造。吴先生的原发创造，非常有说服力地证明，中国人在向西方思想文化借鉴的同时，也必须重视对自己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和借鉴。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创造和积淀了极其丰富、灿烂、深邃、博大的思想文化。这种思想文化，历来为世界各国的思想家、艺术家、宗教家和科学家等有识之士所重视和研究。即使是中国人自己在亵渎和毁坏这种思想文化时，例如“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废除汉字”等，以及“文化大革命”所谓的“破四旧”，都没有动摇和影响上述中国以外各国有识之士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重视和研究的热忱。历史发展到 21 世纪的今天，回顾以往的 20 世纪，不能不使我们感叹“旁观者清，当局者迷”。20 世纪的历史证明，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来说，中国以外的各国有识之士似乎比中国人自己具有更清醒也更正确的认识。当然，经过逐渐深入的反思，现今中国人也逐渐觉醒，开始重视自己的传统思想文化了。不过，这种觉醒和重视还有待深化，并且在填平与传统思想文化断裂鸿沟这个大问题上，还需要众志成城，采取坚决而有力的措施。

20 世纪初，中国的先进人物在迫于救亡压力的激愤中，特别是在倡导和实践“全盘西化”中，几乎忘记了一个重要的常识：那就是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乃是成其民族之人的根本规定性。中国传统文化乃是中国人的根本规定性。就是说，一旦中国人丧失了自己民族的文化，就不成其为中国人了。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乃是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根基。我们在言谈中几乎不离口的“中国特色”，其最根本的特色就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而且只能出自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是从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根基上发出的新枝和开出的新花。有一句著名的话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里，所谓“民族的”，就是指不同民族文化。这句话所蕴涵的真理是：世界文化并不是清一色的文化，而是各民族多彩文化的汇集和融合。而世界文化的高峰，就是各民族文化高峰的群峰林立。如果我们承认这个真理，我们就不能不特别珍视和特别重视中华文化了。相反，如果我们还沿照“全盘西化”的路子一直走下去，中国还能成其为中国吗？还有中国特色可言吗？

当然，任何民族文化在历史中的发展，都不可能完全孤立地进行。所以，各民族的文化会通与融合，古已有之。而今，在所谓全球一体化中，这种会通与融合更是大势所趋。但是，所谓会通与融合，不仅不是以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也不是没有主次的混合。相反，任何民族文化的会通与融合，其宗旨都是为了寻求民族文化自身的创新与发展。可知，中国文化今日与外来文化的会通与融合，就是为了寻求中国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因此，这种会通与融合，就必须明确以中国文化为主干和基础，是为了中国文化能开出新花和结出新果。这就如同果树的嫁接，必须分清楚母本与嫁接枝条。前面所谓中国传统文化是规定中国人的根基，其中就包括必须明确中国文化复兴或振兴的母本，乃是中国传统文化。就此而言，外来文化只能作为枝条。现在，为了加强自主研发能力或原创能力，从前述吴文俊先生的例子亦可知，决不能忽视中国传统文化这个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根基。就是说，在引进和借鉴外来文化的同时，必须看到，中国传统文化才是中国人从事原创事业永不枯竭的活水源头。由此我想，如果各行各业的中国人能在热情学英语的同时，也能拿出相当的热情来学习承载五千年灿烂中华文明的古汉语，进而能读懂和领会中国原典的奥妙，则可以肯定，对于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素质，将会得到一个大提升。并且由于能回到原创的活水源头，中国人也必将能展开更加有力的创造翅膀，从而使中国在 21 世纪可持续发展中显示出无穷的后劲。这是我出版此书的希望，也是我的梦想。谨以以上所思所论为序。

2006 年 2 月 24 日于京西稻香湖畔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代 绪 论

——中国的“象思维”及其原创性问题

这里所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中西思想文化比较的问题，而且可以说是这种比较研究中一个本质性的核心问题。因为，讨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在当今中西思想文化会通与融合的大趋势下，只能是在相互参照的比较中加以研究。所谓“本质性的核心问题”，是指中西思想文化不同，究其根源，就在于中西思维方式不同。我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提出和研究中国的“象思维”问题，正是以西方思想文化为参照系，在对中国思想文化作系统研究的过程中逐渐生发出来的问题和认识。我所说的“象思维”，就其所作的概括而言，乃是借以指称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本质内涵和基本特征，而原创性就是其固有的内涵与特征。下面，试把我研究“象思维”及其原创性问题的一些认识简要地分述出来，以供讨论。

(一) 西方的概念思维与对中国古典文本的领会

在面对中国思想文化经典时，例如面对《周易》、《老子》、《庄子》、儒家“四书”以及禅宗诸典籍时，我们不能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它们是用怎样的思维方式孕育和创造出来的？显然，它们的孕育和创造，不是用现代中国学者熟悉的西方思维方式，即不是用理性的逻辑的概念思维方式，而是用现代中国学者已经陌生甚至几乎“集体失去记忆”的思维方式——“象思维”(关于“象思维”的本质内涵与基本特征，后面再谈)。如果这里所作的判定是正确的，或者说，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那么，下面提出来的问题就是目前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事实说明，自 20 世纪初，尤其是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由于中国整个教育体制的全盘西化，中国自那时无论是“留洋”的海归学者，还是中国自己“洋学堂”培养出来的一代代学者，在思维方

式上也几乎都全盘西化了。所以，从那时至今，中国学者几乎都是在用理性的逻辑的概念思维方式解读和诠释中国的传统经典。这样，就不能不问：这种解读和诠释的效果如何？是走进文本还是肢解文本？如果说是走进文本，又是在什么意义上走进？如果说是肢解文本，又是在什么意义上肢解？这些问题其所以值得特别关注，乃是与中国现代倡导的民族文化复兴密切相关。就是说，中国的文化复兴要复兴到哪里去？要不要冲破西方话语霸权，从而能在思想文化上建立起中国自主的独立话语？如果需要在思想文化上建立自主的独立话语，又当从哪里入手？这确乎是值得当代中国学者深思的问题。

（二）原创性思维在现代中国何以淡薄与缺失

上一节提出的问题，归结为建立中国自主独立话语从何入手的问题。那么，从何入手呢？为了展开这个问题，似乎应当对于“中国现实发展中最缺乏什么”这个问题，作出必要的分析。中国人口众多，但几乎所有地方，都缺乏人才，尤其缺乏高级人才。以至于不少地方，在经济发达和财富激增之后，就从发达国家高薪聘用人才。不仅在科学技术上采取“拿来主义”，而且在人才上也采取“拿来主义”。这种现象，最早出现在珠江三角洲，现在正蔓延中国各地。所谓高级人才，乃是指具有自主研发能力和创造能力的人才，也就是具有原创性思维能力的人才。由此可知，中国缺乏人才的本质问题，可以归结为原创性思维的淡薄与缺失。造成这种淡薄与缺失的原因有多种，但是根本原因之一，乃是中国人在思维方式上全盘西化之时，把自己独具原创性的“象思维”完全遮蔽甚至“集体失去记忆”。

当然，不可否认，就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整体而言，在进入现代以来，已经显示出它的不足和薄弱方面，即缺乏理性的逻辑的概念思维。所以，从近代以来中国向西方学习，弥补这种不足和薄弱，乃是走向现代化的需要。这是必须肯定的。然而，这种弥补却是在所谓“矫枉必须过正”的态势下来做的。在这里，“矫枉”即不要唯“象思维”独尊，而要补其不足和薄弱，无可非议。但是，“过正”，如将独具原创性的“象思维”完全遮蔽，甚至“集体地失去记忆”，则必须从“过正”回到“正”的轨道上来。然而，事情的发展却与此相反。特别严重的是，长时间里，中国人对于自己的“过正”之举毫无觉醒之意。一直到今天，当西方许多大思想家如尼采、基尔凯郭尔、胡塞

尔、海德格尔、梅洛 - 庞蒂、福柯、德里达等，从 19 世纪末以来已经对传统西方思维方式作出深刻反思和对其异化加以批判之后，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主体对此却置若罔闻，仍然倘佯在理性至上和科学万能的科学技术主义思潮之中。如认为只要中国科技能上去就能兴国的看法，即属于这种不知觉醒和落后时代的浅薄之见。由此不难理解，入手处乃在于，应当唤醒对原创性思维即“象思维”的重要性之认识，应当全面健全我们的思维方式，就是说，要使“象思维”的悟性与西方思维方式的理性走向互补，这才是中国思想文化复兴的根本路径。

（三）中西最高理念根本不同之意味

任何思维无不以其最高理念展开。中西思维方式的本质不同，首先也表现在所谓“轴心时期”（雅斯帕斯用语）各自产生的最高理念之不同。在中国的《周易》和儒、道、佛诸经典中，其所提出的最高理念，虽然形式不同，但在本质上都可以归结为“道”。《周易》推崇“太极”的“一阴一阳”之道，道家老、庄推崇“自然”之道，儒家孔、孟推崇“仁义”之道，禅宗推崇“自性”而“性空”之道。这种种推崇的极至，可用孔夫子一句话概括：“朝闻道，夕死可矣”。那么，应当如何领会中国传统经典中“道”这个最高理念？这里，只要与西方差不多同一时期产生的最高理念——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第一实体”相对照，就可以看出两者思维方式的不同，看出“道”思维作为“象思维”的本质内涵和基本特征。我们在亚氏的“第一实体”那里发现，它是推动世界运动的“神”，但是它自己不动，表现为非生成的“现成性”。它在人的主体之外，从而在思维方式上表现为“主客二元”，具有作为人之对象的“对象性”。由亚氏以“第一实体”所奠基的作为哲学形态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在西方一直延续至德国古典哲学，达两千多年之久。其间，无数哲学体系，适应不同时代需要而有不同形式，但是，每一体系中的根本范畴，都继承了亚氏的实体论而表现为不同的实体。例如，中世纪经院哲学把上帝作为最高实体，乃是把亚氏“第一实体”更加具体神圣化。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作为实体，则是试图把神或上帝理性化。莱布尼兹的“单子”所表现的“先定和谐”，也具有神灵韵味，如此等等。所有这些，可以说都以不同形式继承和发挥了亚氏实体论形而上学之思。就是说，所有这些哲学都表现为实体性及其现成性和对象性的特征。值得深思的是，马克思把黑格尔

哲学颠倒过来，实际上是把物质作为最高实体，也最终没有摆脱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就是说，没有摆脱实体性及其现成性和对象性之思。

经过与上述西方形而上学的实体论传统相比较，就可以看到，中国传统道论之“道”，在儒、道、佛各家那里，都不是最终不动的“实体”，而首先表现为动态生成的非实体性。如易道之说：“生生之谓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传》）。亦如老子所说：“道生一，一生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可知，中国传统经典所说的“道”表现为“非实体性”，表现为动态整体的创生性。这种表现已经展示出中国传统最高理念与西方传统最高理念的根本区别。由于中国传统最高理念表现为动态整体的非实体性，所以在思维方式上的特点，也与西方实体论在思维方式上表现为“现成性”、“构成性”与“对象性”不同，而表现为“创生性”、“非现成性”和“非对象性”。因为，作为动态整体的“道”，总是处在“生生不已”的生成中。而且，这种动态之道，从根本上说是“大象无形”，所以不可能作为“现成的对象”。不难理解，这里中国“道”论的潜在前提，乃是以（与西方“主客二元”不同的）“天人合一”整体思维作为出发点，或者说是以主客一体融通的思维作为出发点。

（四）《周易》与“象思维”

那么，如何领会中国传统思维的“创生性”、“非现成性”、“非对象性”的“天人合一”或“主客一体融通”呢？首先，还是与西方传统思维方式作对照。从“主客二元”出发，把不动的最高实体作为现成的对象，西方传统思维从一开始，就表现为理性的规定性，即对实体下定义，并进而作判断、推理、分析、综合。在这里，核心是在抽象思维活动中下定义作规定，即形成概念。整个思维过程，都是围绕实体概念展开。所以，所谓理性的逻辑的概念思维，实质上归结为概念的形成和展开。因此，可以把西方传统思维简称为概念思维。但是，与此不同，中国传统思维，则表现为以“象”为核心，从而围绕“象”来展开。这在《周易》中的表现最为典型。《周易》是标志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成熟或早熟的经典，它产生于三千多年前中国的西周时期。后来，人们把《周易》作为六经之首，不是偶然的。因为正是《周易》所形成的思维方式，构成后来中国儒、道、佛思维方式的基础。确实，在《周易》中，以“象”为核心和由“象”所展开的思维特征，最为明显也最为典型。

在世界文化史上，《周易》具有独特的重要地位。首先，《周易》文本是由阴阳爻“— —”、“——”、数字和文字三种符号形成的思想体系，具有多维编码的特点。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如何看待这三种符号？经过我的研究，这三种符号在本质上都归结为“象”或体现“象”。阴阳爻符号，乃是古贤（据说伏羲）“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而创造出来，源于“象”而又显示“象”。数字符号如六十四卦的卦序，如其中每一卦的六爻位置，都是用数字来显示。这里的数字同样不是抽象的数字符号，而是与“象”一体不可分，显示变动不居的具体时空之“象”。至于说到文字符号，即卦爻辞，在易学史上“象数派”与“义理派”的争论表明，虽然各自都有部分真理，但其片面性，都在于对文字符号与卦爻符号、数字符号是以“象”为基础的内在联系缺乏深入的认识。实质上，卦爻辞的说明仍然是以文字筑“象”，即仍然是“象以尽意”。由此可知，《周易》所奠基的“象思维”可以概括的归结为：“观物取象”和“象以尽意”。

（五）“观物取象”之“观”

上一节所说的“观物取象”和“象以尽意”，看似简单的话语，但却包含“象思维”极其复杂深邃的悟性智慧。其中，“观物”之“观”和“取象”之“象”，“尽意”之“意”，都具有意蕴无穷和难以透彻领会的奥妙。在这一节，主要领会“观”之妙道。这里的“观”，似乎可以借助老子的话来领会。老子说：“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第一章）。老子还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老子》第十六章）。不难理解，“观物”之“观”始于普通的具象之观，但是，要取得“尽意”之“象”，就不能停留于具象之观，而要超越之。超越目视直观的“观”，为的是变成“观其妙”和“观其徼”之“观”，或“观其复”之“观”。老子又把这种超越直观之“观”所达到的思维活动称之为“玄”。于是，这里需要把握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领会超越目视直观的“观”及其所进入的“玄”之思维活动？所谓“玄之又玄”，正表明“玄”的动态性，玄是一种思维活动，也是一种思维境界。“玄”既然超越了目视，就是一种体悟，是一种全身心与宇宙整体契合之悟。老子所说的“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这种思维与对象性的概念思维之不同就在于，万物并不是观者的对象，而是观者就在万物之中，或者说观者与万物一体相

通。所以，“观其复”之“观”，只能是与万物一体相通的体悟之观。

回过头再领会“观物取象”，其“观”就包括双重意义。其一，为直观具象之观，如巫师在卜筮中，首先是观龟甲在烧烫时出现的裂纹。但是其二，若“取象”即取得卦象，却不能从直观之象直接得到，还必须由巫师超越直观的具象之观，而进入全身心与宇宙整体契合的体悟之观。可以说，大视野和高境界，只能是由体悟之观达到。这种体悟之观如何，似乎是难以描述的，带有某种神秘性。如前引老子的话：“致虚极，守静笃”，就有些类似萨满教巫师敬请神灵附体的味道。然而，这种超越的体悟，实际上又很平常，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在艺术家、科学家的创造性生活中，作为大谜大惑之后的新觉醒、新发现，所谓精神的“豁然开朗”，“柳暗花明又一村”，则是经常发生的。当然，同样是体悟而开悟，但层次不同。从《周易》到老、庄道家，其中所讲的体悟，或体悟源于太极的“一阴一阳”之道，或体悟“道法自然”之道，都具有寻求根本开悟的意味。如老子所说，经过“玄之又玄”这样的体悟而开悟，也就从根本上打开了“众妙之门”。经过这样的开悟，人的精神面貌，必然发生根本的改变。《庄子》一书所描绘的至人、真人、神人等，实质上都是用神话的艺术手段描述他对于人所追求的这种根本开悟的改变。

(六)“象的流动与转化”与“无”

关于上述“观物取象”之“观”的领会，已经对于“象”展现出几层意思。“观物取象”的思维与西方概念思维根本不同之点在于，“象”不是不动的实体，不是用定义可以规定的概念；相反，“象”是“非实体”的、“非概念”的，也就是具有非对象性和非现成性的特点。因此，“象”是借助概念用理性和逻辑把握不了的。就是说，“象”是动态的，是“流动与转化”的。正因为如此，“象”具有不同的层次。在“观”的思维活动中已经能领会到，从具象到意象。如卦象已经是巫师经过直观龟甲裂纹的具象而在联想中创生出的意象之升华，并一直可以升华到“大象无形”之“象”，如老子所说的“玄”之“象”。所谓“众妙之门”的开悟，似乎就是在这种“象的流动与转化”中，在“玄之又玄”中实现的。就《周易》而言，所谓“象以尽意”之“象”，显然并不是什么固定不变的象，而是指“象的流动与转化”诸象的总称。不难设想，在巫师龟卜的筮测中，其头脑中所进行的就是“象的流动与转化”过程。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如，从筮测一开始，就有象在巫师头脑中流动。筮测战争，就有战争之象，筮测出行、婚丧，就有出行、婚丧之象，包括其胜败、可行不可行之象，如此等等。就具体筮测而言，巫师在直观龟甲裂纹的具象之后，联想使之生意象，并在“玄之又玄”中升华出卦象。“象以尽意”之象，就是在“象的流动与转化”中不断升华出的卦象。而卦象，无论作为六十四卦之卦象，还是卦中每一爻的卦象（共有 384 爻之卦象），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动态整体中相互联系之象。所谓“动态整体”作为象，就是《周易》的太极之象，或老子所说的“大象无形”之象、“无物之象”。在这里，太极是“无极而太极”，与老子的“大象无形”、“无物之象”，都突出了“无”。

如何领会这个“无”呢？如果从《周易》和《老子》的文本整体思想领会之，就可看出，这个“无”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简单排除或否定之意义，而是对“形”、对“物”、对“极”（“极”在这里指边界的意思，如我们现在所说地球的南极和北极）的超越。经过这种超越，如开“众妙之门”而“玄之又玄”的超越，就使人的精神或思想展开一个通透一切的大视野，升华到一个自由自在的高境界。这种视野和境界，在具体筮测中，就在于此筮测的卦象在某种程度上与动态整体的宇宙一体相通了。在庄子那里，这种视野和境界，就是通过至人、真人、神人所描绘所透露的视野和境界。显然，这种视野和境界的设定，乃是一种理想的设定。这种设定的主要意义，不在于能否达到理想，而是给予常常在精神上画地为牢的人们指引一个走出自我束缚、自我局限的方法和方向。

（七）“道”论的根本“悬置”

也许读者最感兴趣的就是，“无极而太极”、“大象无形”、“无物之象”之“无”，作为“玄之又玄”的体悟之方法，应当如何领会？对于任何思想体系或非体系的思想形态，其方法都最重要，具有其思想之灵魂的意义。因为，无论按照怎样理想的指引前行，都需要有相应的路径或方法。那么，由这里的“无”所提供的是怎样的路径或方法呢？前面指出的“超越”，可以说是这种路径或方法的总括。现在，在进一步领会时，还要对这种“超越”加以具体展开。

为了参照，这里还是先看看西方现代哲学与后现代哲学在批判传统形而上学中所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范畴，即胡塞尔最先提出的“悬置”，也

是被现象学运动中后继的哲学家们广泛使用的方法。正是这个“悬置”法，在开启西方哲学新路径上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过，就此而论，中国道论之思从道家到禅宗在通往其理想的目标时，其方法或途径中也包含有强烈的“悬置”意味。如老子的“致虚极，守静笃”，庄子的“心斋”、“坐忘”，禅宗的“无念，无相，无住”，如此等等，都无不包含这种意味。由此可知，为了追求某种理想的思想目标，中西大思想家在对路径方法上有相当共识和相通之处。但是，中国道家和禅宗提出上述相当于“悬置”的“象思维”诸词语，并不止于单纯“悬置”的意蕴，而同时就是一种开悟，或者说同时就是视野和境界的根本提升。可知，这种包含“悬置”意味的“超越”，其更重要的内涵还在于，它的“悬置”不是个别、具体、枝枝节节的，而是带有根本性的，因此它带来的“超越”也是带有根本性的。如庄子在《齐物论》篇通过子綦之口所说的“吾丧我”那种根本性的“悬置”和“超越”，又如六祖惠能在其著名的偈中所说的“本来无一物”那种根本性的“悬置”和“超越”。

事实说明，由于缺乏根本性的“悬置”意蕴，所以，在有的西方哲学家那里，虽然能打破形而上学传统的某些束缚，但还不能完全与形而上学割断联系。例如，胡塞尔就是如此。由于他始终没有摆脱从笛卡儿到康德的“主体性意识”为核心的哲学路线，所以，他经过“悬置”的突破就是有限的。就这个问题而言，在真正决定意义上作出突破的西方哲学家，首先是海德格尔，后来是梅洛 - 庞蒂。前者在从“缘在”(Dsein) 入手追求“存在”(sein) 意义时，开显出“存在论”的哲学维度，而这无论对于回归人本身，还是所谓“回归事情本身”(一般都译为“面向事情本身”，我作此意译)，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而梅洛 - 庞蒂则在海德格尔开显的维度上，更具体地回归到肉身人的“存在论”维度。在这种维度上，梅洛 - 庞蒂不仅使心灵与肉体一体化，而且使主体人与他人通过“肉体间性”得以更加本真的相通，同时还具有进一步打破主客二元思维定式的意味，趋向“天人合一”之思。例如，他对自然的看法，就如此说过：“自然是一个谜一般的对象，一个并非完全是对象的对象，它并非完全在我们面前，它是我们的土壤，不是那种在我们面前的东西，而是那孕育我们的东西”①。所谓“后现代”，就哲学而言，准确的说法是指西方哲学进入“后形而上学”的时代。从海德格尔和梅洛 - 庞蒂两人的哲学，不难看出这种时代的特征。这种特征表明，不论他们

① 转引自杨大春：《感性的诗学——梅洛 - 庞蒂与法国哲学主流》，人民出版社，2005。

是否自觉，在他们解构西方形而上学之时，他们的哲学倾向，实质上是在向东方思想主要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意味趋近，即向“天人合一”的、全身心与宇宙契合的（如海德格尔崇尚“天地神人四位一体”，梅洛－庞蒂通过普遍“肉身化”弥合主客二分）、诗意感悟的（海德格尔对“诗意的栖居”反复咀嚼，梅洛－庞蒂对感性和混沌性的钟情）等中国传统道论思想韵味趋近。

在领会“无”这种带有根本“悬置”意味的“超越”之作为体“道”的路径或方法时，对照梅洛－庞蒂借普遍“肉身化”以弥合心灵与肉体、主体与他人、主观与客观世界二分之思，使我们不能不想到中国传统道论之思对于“体”的特殊青睐。如对于体“道”而言所说的：体会、体验、体味、体悟、体认等等。如何领会这个“体”呢？这个体，显然不是脱离心灵或精神的单纯肉体，而是灵肉一体之“体”，并且这个灵肉一体之“体”，还是能与宇宙整体之体一体相通之“体”，如庄子所说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由此可知，与西方传统实体论形而上学所孕育的理性的逻辑的概念思维不同，中国传统道论之思所孕育的，则是悟性的在“象的流动与转化”中体悟的“象思维”。

（八）“象思维”之本原性及其原创性

从思维发生史上看，比起理性的逻辑的概念思维，悟性的“象思维”是具有更加本原性和创造性的思维。这种本原性表现在，其一，“象思维”是前语言、前逻辑的思维。从整体上看，它在人类的童年，在人类还没有发明语言和逻辑之时就产生了。例如，那时借岩洞壁画所表现的思维就是一种。就个体而言，“象思维”在婴幼儿还没有学习语言时就产生了，例如，婴幼儿已经能对感触的形象物作出种种反应。其二，“象思维”在文明的初级阶段，各民族的神话里已经表现出，它是具有极其丰富的想像力或创造力的整体思维。其三，“象思维”的原创性尤其表现在，作为标志人类文明进入成熟阶段的语言文字、逻辑概念，也是源于悟性的“象思维”而创造发明出来的。

由此可知，悟性的“象思维”乃是人类文明最终的创造性的思想根基。即使在当今时代里，在悟性的“象思维”已经被异化形态的理性和工具理性遮蔽的情况下，这种悟性的“象思维”也作为文明发展的思想根基，在不动声色地发挥作用。此外，中国的“象思维”本身也经历了文明初始阶段和文

明成熟阶段的发展。在文明初始阶段，这种“象思维”还带有本能的稚气，例如主要表现为神话那种想像力的特殊爆发。而在文明成熟阶段，即在所谓世界历史的“轴心时期”，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这时中国的“象思维”，其本原性没有改变，但是，由《周易》、道家经典也包括儒家经典所体现的思想形态，则使“象思维”上升到更加具有深刻内涵和突出特征的体系，如前述“观物取象”、“象以尽意”和“玄之又玄”以开“众妙之门”等等。特别是，对于文明发展二重性中的弊端，“道”论的悟性的“象思维”还同时提供了揭露和批判扬弃这种弊端的武器。

至于本文提出“象思维”的原创性问题，虽然是针对原创性缺失的问题，但主要还是把它作为“象思维”的本真本然来阐发的。联系到前面所说的根本性“悬置”来看，悟性的“象思维”在思的层面，就是从根本上把理性的逻辑的概念思维加以“悬置”，从而表现为非理性、非逻辑、非概念的特性，或者说，具有超越理性、逻辑、概念局限的特性。从正面来说，这种思维乃是表现为“象的流动与转化”中诗意的感性、“物我两忘”的混沌性、模糊性。以往人们普遍肯定这种思维特性为艺术创造所必需，或者说有利于艺术创造。在艺术之外，悟性的“象思维”似乎就没有用武之地了。这种看法，现在看来是非常片面的。实际上，不仅艺术，而且在科学、文化、生活实践等各个领域，一切创新问题的发现和提出，都离不开悟性的“象思维”并以之为最终基础。或者说，各领域的创新问题的发现和提出，都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在“象的流动与转化”的模糊混沌中，经过“玄之又玄”的超越常规之思突然间体悟到的。“生生”的道性本身，就是常新的。为“道”所贯通的天、地、人“三才”即整个宇宙，也是在“生生”中，每时每刻都是新的（与黑格尔在其《自然哲学中》所说的“太阳底下无新事”完全不同），并且得“道”之人，也能青春常在。如庄子在《大宗师》篇所描绘的女偊，因为得道，虽然年长，却“色若孺子”。所以，全身心与“道”贯通或与宇宙契合之悟性的“象思维”，也必然能与宇宙的“生生”相应，发现其常新之新。这乃是悟性的“象思维”的本真本然之性。因此，可以说，悟性的“象思维”乃是“原发创生”的思维。或者说，它既是本原的思维，同时又是最富于创造性的思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诉诸动态整体的悟性的“象思维”，不仅受到现代西方思想家的重视，而且也受到现代自然科学家的重视并借以推动科

学的发展，在实践中正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①

当然，在这里强调悟性的“象思维”的本原性和创造性，并不是否定理性的逻辑的概念思维的价值和意义，更不是要以悟性的“象思维”取代后者。因为，即使悟性的“象思维”能发现和提出新问题，但如果没有理性（包括工具理性）的逻辑的概念思维去具体解决和实现，那么，这些新问题的解决和实现也只能停留在神话式的想像中。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人近现代由于与自己的传统文化断裂，在思维方式西化中，使原本自己所长的悟性的“象思维”遭到遮蔽，甚至在现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已经“集体地失去记忆”。显然，在推进中国民族文化复兴中，这是我们不能不面对和重视的问题。

（九）汉语语言文字与诗为“象思维”产生条件

在对于成熟形态的中国“象思维”的深入研究中，关于这种思维方式产生的文化背景条件，也是必须追问的问题。这种背景条件有两个方面最值得重视。其一，是汉语语言文字与“象思维”的关系；其二，是诗与“象思维”的关系。

中西在跨向文明门槛之时，在语言文字的创造上，都始于“象形”。但是，在跨入文明门槛之后，作为成熟的语言文字的创造，中西就分道扬镳了。就语言文字而言，西方是字母拼音的音节文字。这种文字是彻底排除象形性的、完全符号化的文字，在视觉上表现为一维的线性文字。与此不同，汉字则仍然顺着象形性和保留象形性根基的方向发展，不是诉诸拼音，而是诉诸拼形的文字。在视觉上表现为二维性（暗含三维性）。所谓“六书”的造字，主要是前“四书”，即“象形”、“指事”、“形声”、“会意”构成造字法，而“假借”、“转注”则属于用字法。实质上，“四书”都是以“象”为核心。如被清代文字学家王筠称赞的班固，就在《艺文志》中指出，在“象形”之后的“三书”，亦可称为“象事”、“象声”、“象意”②。不错，汉字的字形从甲骨文、金文、篆书到隶书有其逐渐符号化的变化，但是，所有这些变化，都没有改变象形性作为汉字的根基。正是汉语言文字这个象形性根基，对于

① 参见李世辉：《科技创新与中西文化互补之我见——六个典型实例的思考》，《中国工程科学》，2005 年，第 4 期。

② 参见王筠：《文字蒙求》，37 页，中华书局，1962。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具有本质性的影响。

如果说西方拼音的语言文字，借助严密的语法和文法以音来表意，特别是其主谓词格的表达，已经孕育了亚里士多德“S是P”这一基本逻辑规律，从而为西方理性的逻辑的概念思维奠定了基础，那么，中国拼形的语言文字，没有严密的语法文法，没有“S是P”的逻辑结构，而借助严格的语序或词序以形来表意，则为富于诗意的悟性的“象思维”奠定了基础。由此可知，正是汉语言文字的特性，规定着中国传统思维成为富于诗意的悟性的“象思维”。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对于中国文化而言，汉语语言文字乃是她的根基①。在这里附带要指出的是，汉语语言文字在汉代经过隶变，使之也具有了不亚于西方文字的符号的性质和功能。但是，与西方语言文字符号化发展完全抛弃象形性不同，汉语言文字在符号化之时仍然保留着象形性根基，从而还使之具有别具洞天的功能。

人们都知道，诗是通过语言文字吟唱或写出来的。这表明语言文字先于诗的产生。但是，就诗意借助象的表达而言，它却先于语言文字就产生了。这个问题，在前述讨论悟性的“象思维”本原性时，已经有所涉及。在这种意义上，作为萌芽状态的诗又是先于语言文字的。这种先于语言文字的诗意，正是悟性的“象思维”本原性之所在，也是其创造性之所在。因此，可以说，比起汉语语言文字作为中国文化的根基而言，这种诗意则是这个根基的根基。这种诗意的混沌性与模糊性，即使在文明初始阶段，也已经使那时的神话创造具有把握动态整体的“象思维”特性。在中国文明的成熟阶段，这种诗意的混沌性与模糊性，更体现在《周易》、《老子》、《庄子》、《六祖坛经》等文本的创作之中，使这些文本所蕴涵之悟性的“象思维”都具有给人从根本上拓展视野和提升境界的指引。就领会和把握动态世界整体而言，这种诗意的悟性的“象思维”则充分显示出，她是优越于理性的逻辑的概念思维的。后者，作为主客二元的对象化思维模式，在领会和把握世界时，首先就把主客本来一体的整体性加以割裂，并且在对象化中又把这种被割裂的整体加以僵化。因为，不僵化，就不能作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就不能作出明确的规定。这样，就不难看出，这种领会和把握，只能是有限的、与整体割裂的、被僵化的世界。相比之下，富于诗意的悟性的“象思维”，她的诗意混沌性和模糊性，正可以在“物我两忘”中，进入“天人合一”

① 参见王树人、喻柏林：《传统智慧再发现》，上卷，第一章，作家出版社，1997。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